

华侨华人与中国改革开放起步研究*

范宏伟

中国改革开放史有太多的视角和议题可供研究,不过华侨华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缘起和共生逻辑关系,决定了这是一个独特而无法忽视的视角。中国在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奇迹”之后,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这一夙愿的产生发端于近代中国所陷入的苦难与民族危机,而华侨问题则是这场危机的结果之一。19世纪中期,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威逼下被迫对外开放,其中允许华工出国也成为要求清政府对外开放的条件之一。自此,大量的中国人出国,遍及海外各地,开启了“中国侨民无落日”的时代。但是,清政府国力孱弱,“内则国家渐次沦于次殖民地之悲境;外则侨胞备尝苛例禁律之虐待,如坠深谷,无法自拔”^①。因此,华侨问题本身既是中国被迫开放的结果,又是中华民族遭遇危机的表现之一。华侨华人由此成为审视中国与外界关系以及中华民族命运变迁的最佳视角。

作为近代中国衰败危亡的受害者和见证者,华侨的命运从一开始就与中华民族的复兴息息相关。近代以来,这一群体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与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1978年启动的这场中国巨变中,华侨华人发挥了先行者、探索者等不可或缺的作用。华侨华人介绍和引进国外先进的思想、市场经济观念和管理经验,通过侨汇、投资、捐赠、引智等方式直接参与、推动改革开放,特别是在引资、引智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据统计,改革开放40年来,侨商投资占中国引进外资的60%以上,侨商投资企业占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70%,引进的高层次人才95%以上是华侨华人^②。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在40年间向国内社会公益事业的捐赠累计已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他们的捐赠热情和数额还在持续高涨,捐

赠地域和领域不断扩大,捐赠方式和主体日益多元化,对国内突发灾害和重大事件的捐助尤为积极^③。

华侨华人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贡献重大,但其作用和影响在这一进程的起步期(1978—1992)尤为独特和深远,值得深入研究。这一议题的重要意义是通过另外两个独特性体现出来的。其一,改革中途停滞、半途而废的案例在古今中外都不鲜见。因此,改革顺利起步并逐渐获得不可逆转的动力与势头,正是确保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前提。中国改革开放史的分期虽然尚无定论,但是1992年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的分水岭意义毋庸置疑。在此之前的试验、起步期,改革创新者与旧体制、旧思想观念和旧势力一直在进行艰苦的角力、拉锯,最终在1992年实现了质变。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明确,标志着中国改革在经历了初期激烈的争论、徘徊之后,最终越过了市场化转轨在观念和结构上的临界点,由此进入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阶段。^④其二,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华侨华人的作用和角色就像能让改革者摸着过河的石头。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未有过先例和模板来供模仿和学习,所以充满了不确定性、风险性和开创性。对此,中国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策略。从改革开放的总体进程和演进路径来看,

* 本文是全国侨联项目(17BZQK101)的阶段性成果。

① 济川《革命之母》,《国民外交月报》第1卷第9期,1943年9月。

② 严瑜《侨这四十年,与国共奋进(侨界关注)》,《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12月14日。

③ 张秀明《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对中国慈善事业的贡献探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8年第4期。

④ 萧冬连《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前言”页。

中国采取了由点及面、逐步推进的政策。首先以四个经济特区为试验点和突破口，成功之后再由经济特区扩展到14个沿海开放城市，随后扩大到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带，最后到沿江、沿边和内陆地区，形成了分步骤、多层次、逐步开放的格局。在这个逐步试验、探索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没有第一步四个特区的试水成功，就很难有稍后坚定信心、继续扩大开放的决定，而这一关键性的起步正是与华侨华人密切相关。

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也是因侨而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中央酝酿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国内最大的两个侨乡——广东和福建两省在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提出，利用侨乡的优势，放权可以“先走一步”。三个月后，经过评估，中共中央、国务院认可二者“靠近港澳，华侨多，资源比较丰富，具有加快经济发展的许多有利条件”，决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并同意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出口特区。^①在此后四个特区的试办和闽粤两省的先行先试过程中，海外华商扮演了关键角色。从1979年到1991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268.85亿美元，其中海外华商投资额约为179.32亿美元，占到2/3^②。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中国基础设施落后、投资环境不够透明和完善等原因，外资普遍对中国改革开放缺乏信心，海外华商就成为外来投资的先行者和生力军，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了急需的资金。更重要的是，海外华商这种先行者、探路者的角色和作用对于中国继续改革开放进程意义深远。对外，在外国资本裹足不前的状况下，如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因应，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将会陷入一个应者寥寥、难以为继的困境。海外华商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为随后吸引更多的外资发挥了榜样与引领作用。对内，华商投资的成功印证了闽粤两省利用“特殊政策”发挥侨乡优势的可行性与可能性，坚定了中国改革者继续前行、扩大开放的信心和决心。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

时表示，深圳特区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③。东南沿海侨乡改革开放成功的示范作用在很大程度上缩短了其他地区改革的摸索过程，降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探索成本^④，帮助中国完成了市场经济样本的发育成形^⑤。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华侨华人的贡献与作用至关重要。但是，对于这一结果和现象，有关研究存在两大缺陷。

第一，学界的大部分相关研究是在民族国家框架下，以中国为视角来讨论和勾勒华侨华人对改革开放的贡献。这种以中国为中心观的叙事，简单化了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忽视了华侨华人的历史主体性，实际上复制了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曾被批评用于研究中西关系的“冲击—反应”模式，即中国发出号召，华侨进行因应或者至少是某些华侨有所响应^⑥。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号召—呼应”模式难以全面揭示华侨华人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作用的动力与机制，需要更多从华侨华人的视角来研究这一群体对于改革开放的认知—反应变迁。其中，华侨华人如何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的不确定性与机遇性这两大主题，是还原双方互动过程的主轴。

其一，关于改革开放的起步，国内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和不足。从宏观上来说，华侨华人与中国改革开放的互动并非始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序幕，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前中国是与外界完全

①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3页。

② 林金枝《1979—1992年海外华人在中国大陆投资的现状及其今后发展趋势》，《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9页。

④ 龙登高《粤闽侨乡先行改革的社会成本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⑤ 商务部研究院编著《中国吸收外资30年》，中国商务出版社，2008年，第135页。

⑥ Shelly Chan, *Diaspora's Homeland: Modern China in the Age of Global Migrati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4.

隔绝、铁板一块的。实际上，从70年代初开始，中国已经着手恢复与外界的互动与联系，特别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后。例如，1971年中央出台相关规定，依照“从宽批准”的原则恢复了对归侨和侨眷出国的审批。随后，东南侨乡大量民众出国。到1976年，福建批准出国11067人，积压待办的申请有7万多份。1972年，中国与外界关系的变化、中国国内的变化迅速引起了海外华侨华人的关注。是年初开始，越来越多的世界各地华侨华人、港澳同胞要求来华参观、旅行和探亲。为此，1972年中央批准恢复华侨旅行社总社（一些地方政府随后也根据需要成立了华侨旅行社）加以因应，成立华侨问讯处，处理华侨、归侨和侨眷的来信来访、查找亲人等事宜。从1972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来到中国参观和探亲。例如，1971年到1977年，前往福建漳州地区的国外华侨华人就达3897人。1978年4月，李先念还专门批示相关部门要加快建设重点旅馆，特别是北京和广州，“因为进出的客人特别多，接待任务很大”^①。这一时期中国通过华侨的管道与外界恢复了联系，华侨华人也返乡探寻中国的变化。尽管这些变化的力度还较为有限，但它们是1978年发生骤变的重要前奏和铺垫。

其二，1978年中国启动的改革开放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但对于这场巨变的真实性与可持续性，国内外都仍有相当大疑虑。例如，1987年，习仲勋考察广东这一改革开放的前沿省份之后，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中第一条就是“不少人仍然担心党的基本政策发生变化”^②。这一时期华侨华人对改革开放也多采取谨慎和观望的态度，所以初期对华投资多以“三来一补”和其他小额投资为主，具有试探性质和追求短期回报的特点。因此，改革开放初期，面对国内的这些不确定性，从华侨华人的认知角度可以更好地反观和检视改革开放政策的有效性。例如，相关归侨侨眷政策落实后，其积极影响是如何扩散、传导到他们在国外的亲属、同乡的，恢复、重拾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国的信心与支持的症结点是什么，前者最关心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哪些改革和侨务政策、统战措施对华侨华人的冲击力最

大、效果最好，哪些问题和因素又导致这一阶段华侨华人质疑改革开放的真实性，邓小平南方谈话与当年华商投资即开始暴增的关系，等等。

其三，对于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邓小平曾将前者视为中国发展可以借重的“独特机遇”^③。实际上，机遇是相互的。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华侨华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以及改革开放对中国自身的影响，而忽略了这一变革同样为华侨华人提供了独特的机遇，对世界造成了广泛的影响。爱国爱乡是华侨华人在中国投资的原因之一，但其本质上都还是投资者，从长期来看经济收益才是决定和影响其投资行为的根本原因。华侨华人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二者在此过程中实现了双赢与互利，因而才能在改革开放40年中相伴前行。这些都需要从华侨华人企业史的角度进行专题和个案研究，还原和分析华商在改革开放中的成长、发展历程，以及他们在中国的成功投资和发展是如何反哺其所在国即将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分享给其他国家的。改革开放后，一些国家对本国的华侨华人来华投资持怀疑和猜忌态度，怀疑资本外流，认为他们对当地国家缺乏认同和忠诚。华侨华人企业利用中国发展机遇获得成长、回流返利，不仅可以因应这种猜忌，而且也是在演绎当下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方案的范例。

第二，对于华侨华人与改革开放的讨论和研究，多拘泥于单纯的成功史、贡献史的叙事模式。这种导向的研究又多以数据和事迹来定性描述和呈现结果，忽略或跳过了政策过程的讨论，简化了历史的完整性、全面性，导致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些基本的环节和逻辑出现断裂与缺失。这种对过去的选择性解读，就不可能使我们对现在的了解更加确实^④。“事实上，如

① 《建国以来李先念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8页。

② 《习仲勋文集》（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1160页。

③ 《邓小平论侨务工作》，国务院侨务办公室，1998年，第47页。

④ （英）S.肯德里克等编，王辛慧等译《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页。

果人们没有首先充分认识造成各种社会现象的特殊因素以及各种现象最终形成的总体环境，人们就无法合理研究其静态或动态的情况。”^①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影响，“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广大归侨、侨眷因为有所谓‘海外关系’或其他‘问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往往受到冲击，不少人甚至成为斗争对象”，“文化大革命”“更是给广大归侨、侨眷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使许多人蒙受冤屈，不少人被迫出走，重新去过海外游子的生活。这许多亲痛仇快的现象，严重伤害了广大华侨的感情，严重败坏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声誉”^②。

1978年后，中国试图借助海外华侨华人的力量，首先在两大侨乡省进行改革开放，那么就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前提，即如何重塑自己在海外的正面形象，修复以往对这一群体造成的伤害，赢得国内归侨、侨眷和国外华侨华人的信任和支持。这是讨论和观察改革开放之后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逻辑起点之一。以往研究基本是叙述1978年之后中共采取了何种政策与措施在侨务领域进行拨乱反正，恢复和保障归侨侨眷的各种权益和利益，进而赢得国内外侨界的支持与欢迎。历史学的使命正是要研究我们所观察不到的那些事件^③，但这种由此及彼的两点式跳跃研究，略过了政策制定者、执行者与政策对象的复杂互动过程，难以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同时遮蔽了改革开放的艰辛曲折过程。

中国在侨务领域的拨乱反正、落实争取华侨华人政策本身就是一个困难重重、不断克服阻力的过程。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历史决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在现实中，这一进程远未结束，解放思想、消除“左”的影响绝非易事。至今，中国仍有人怀念“文化大革命”，足见破除“左”的影响与束缚的难度。习仲勋在1984年曾批评说，不少人在侨务工作中“首先想到的往往还是什么‘海外关系’、‘历史不清’、‘背景复杂’等所谓的问题，因而心存疑虑，缩手缩脚”^④。同年，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对当时统战政策落实不得力的原因总结为“一方面是有‘左’的影响，顶着

不办；另一方面是有些实际困难”^⑤。

困难虽然重重，但是这些举措是中国成功发挥侨乡优势、争取“三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支持改革开放的前提。初期的改革开放是面向西方的开放，旨在融入经济全球化。如何对待来自海外的华侨华人与其在国内的亲属即如何处置与外界的关系，决定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与最终能否成功。所以，正如杨静仁所说“引进先引人，引人先引心”，“政策不落实，‘三胞’不愿来”^⑥。为此，中国自上而下，在侨务、统战、政协、政党等诸多层面不断破除“左”的重重阻力，落实对侨统战、争取的政策，推进改革开放。例如，侨房问题复杂，矛盾多，解决难度大。对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和部门先后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文件、通知来破解这一困局。侨房是维系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的重要纽带，是祖脉所系、根之所在，因此侨房问题是侨务政策的重中之重，是重获海外侨心的良策。一位美国华人企业家在侨房问题解决之后，深受感动，引资24.6亿日元回乡投资办厂。^⑦这些丰富的政策实践、案例为我们提供了理想的研究样本，亟须展开实证、个案研究，反思、总结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与教训。这也是史学工作者的职责，“历史学者最有能力做的是，使人们建立起与过去的各种联系，借此而解析现在的疑难，启发未来的潜能”^⑧。

（本文作者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南洋研究院教授 厦门 361005）

- ①（法）奥古斯特·孔德著，黄建华译《论实证精神》，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8页。
- ②《习仲勋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91页。
- ③（英）柯林武德著，何兆武等译《历史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9页。
- ④《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第292页。
- ⑤《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第437页。
- ⑥《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第436页。
- ⑦陈志明等主编《跨国网络与华南侨乡》，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2006年，第195—196页。
- ⑧（美）乔伊斯·阿普尔比等著，刘北成、薛绚译：《历史的真相》，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9—10页。